

結合理論與方法、連結學術與生命： 評《四位一體的社會學之道》

陳瑞樺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合聘副教授

《四位一體的社會學之道：技法、基本議題、認識論與存在感》，謝國雄著，新北：群學，2023 年 12 月，458 頁。

脈絡與指向

1. 傳記與機構史的脈絡

本書是謝國雄教授提煉其社會學教育理念及研究心得所撰寫的著作。

謝國雄於 2007-2010 年間擔任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期間推動的課程改革可歸納為兩個理念：其一，結合理論與方法；其二，連結學術與生命。¹ 基於上述理念，在解讀社會分析經典著作時，不只要理解作者說了什麼，也要探討這些研究是怎麼做出來的；在進行社會研究實作時，不只要提煉基本議題、鍛鍊研究技法，也要探問這些議題和技法背後的認識論及存在論。

《四位一體的社會學之道》便是這樣一部結合理論與方法、連結學術與生命的作品，它讓我們看到一位抱持「學術本分觀」的學者如何結合理論與方法來解析經典著作，如何將學術與生命的連結通過「存在感」加以闡發，從而以經典著作為案例來說明社會研究的四位一體，更進一步以自己的研究作品及研究者身分體現了社會學研究的

台灣社會學第 47 期（2024 年 6 月），頁 157-167

1 謝國雄對其課程改革理念的說明，參見：〈攜手共創清華社會學——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所長就職演說〉，<https://www.ios.sinica.edu.tw/people/personal/etshieh/攜手共創清華社會學.pdf>

四位一體。

2. 建構社會研究的整體性與系統性

本書是一位從事質化研究的學者，努力綜整其研究心得，試圖整體性且系統性地探討社會研究做什麼、為何做、如何做的專著。根據謝國雄自述，² 在他養成學術技藝的年代，量化研究是每位研究者都必須嫻熟的研究方法。相較於量化方法有著嚴謹的操作準則，那個時代的質化研究尚未能建立系統化的操作步驟與方法。為質化研究建立如同量化方法的嚴謹性，成為謝國雄寫作本書的其中一個心念，表現為本書在寫作上的整體性和系統性。

就整體性而言，本書提出一種社會學研究的架構，這個架構從提問開始，接著依序探討基本議題、技法、認識論、存在感，最後以四位一體來總結。以本書第十章討論的主題「整體：渴望、視野與想像」為例，該章說明將「社會」視為整體，「將這個整體當作研究的目標與成果。……以整體當作研究目標與研究成果時，其主要的工作是勾勒出田野理路，並且確立這個田野理路的特徵」（頁 356）。如果將「社會」代換成「社會研究」，「社會研究」在本書也被建構為一個整體，有其理路，這個理路就是「四位一體」。本書探討社會研究的整體性，並且以其研究成果體現了社會研究的整體性。

就系統性而言，本書除了通過「四位一體」架構出社會研究的整體性，並且在各部分進行了系統性的解析。舉例而言，作者在闡述位於分析架構和田野工作這兩端之間的研究技法時，整理出標明特徵、類型化、概念化、重新概念化、捕捉意義等作法；又如，在第九章「建構研究對象」中，先區分了社會生活的三重建構（社會自身的建構、報導人的建構與研究者的建構）以及社會學家的雙重角色（兼具

2 2024 年 1 月 26 日在中研院社會所舉辦的新書座談會，以及同年 2 月 29 日於台灣大學社會學系的演講。台大社會系演講的側記由黃科量撰寫，參見：https://sociology.ntu.edu.tw/info-on-home-page/cate-event/四位一體的社會學之道：技法、基本議題、認識論/?doing_wp_cron=1714295010.2049820423126220703125

常民與研究者），接著在第二節「社會的建構」以 Abrams 對國家的討論為例，提煉出：1. 對象化、2. 標明特徵、3. 概念化、4. 重新概念化等解析社會建構的方法；繼而說明建構研究對象與認識論的五種關連（1. 對認識論的反思、2. 作為「態度」的認識論、3. 具有認識論面向的各種具體操作、4. 建構研究對象帶來的認識論效應、5. 以這些認識論探究成果作為建構研究對象的目標）；然後說明建構研究對象的三部曲（確立現象、與現象斷裂、重構現象），進一步解析研究者的三種選擇（反向建構、共謀建構、基進的建構）。上述例證所涉及的各個項目，在本文有限的篇幅中無法一一闡述，然而即便只是列出上述概念所形成的層次關係，已可見到作者試圖有系統地闡發社會研究所提出的細緻分析。

本書以「四位一體」的架構及對此架構內涵的探討，整體且系統地闡發了社會研究是什麼，並以自身的「骨架、血肉及精神」（作者引述 Malinowski 提出的田野分析架構），體現了社會研究的整體性與系統性。

四位一體、田野理路、存在感

接下來我將討論三項最能標誌作者社會研究心法特徵及其貢獻的概念：四位一體、田野理路與存在感。

1. 四位一體

「四位一體」架構的提出，可以追溯到謝國雄於 2004 年秋季開始教授「田野工作：範例與實作（上）（下）」。¹在這門課的課程大綱中，對「四位一體」有如下的說明：

田野工作一石四鳥：蒐集與創造資料、切磋與創新理論、反省社會學知識的認識論以及呈現各種生命情調相互激盪的存在論。……田野工作四位一體的意義：同時觸及了具體操作、基本議題、認識論與存在論，這四者緊密相連。（謝國

雄 2007: 365)

在 2007 年出版的《以身為度、如是我做：田野工作的教與學》一書中，謝國雄如此說明「田野研究」與「四位一體」的關係：

在田野研究中，技法與基本議題，是可見的，也是討論的焦點。涉及「行動者與研究者如何知道與認識社會生活」的認識論則偶爾浮現，但甚少被搬上檯面正面處理。而涉及「研究者的終極關懷、為何要進行學術研究等」的存在論則更加隱晦。通常隱身在著作之後，讀者必須透過各種蛛絲馬跡來解讀。

……其他的研究取徑（如計量、「次級」資料分析、與歷史檔案探索等），是否也有「四位」、「四位」是否為「一體」，則有待採取這些研究取徑的學者現身說法。

雖說是四位一體，但這四位一體皆是因為探究社會生活而起，更精確的說法，這是作為研究者的四位一體……研究者採取了田野工作的技法，目的是要對社會生活中的基本議題有深刻與突破的理解，但也因為這個技法的特殊性，觸動了其認識論的警覺與存在論的關懷。四位「一體」，反映了我的立場，但四位「一體」的初衷與目的，終究是做出深刻與原創的研究。這是學術本分的立場，是一種在上述四位一體背後的後設存在論。（謝國雄 2007: 4-5）

從這段文字可以得知，在這個時期，「四位一體」還只是用來說明「田野工作」所涉及的面向。值得注意的是這段話中的兩個「因為」：「因為探究社會生活而起」，以及「因為〔田野工作〕這個技法的特殊性」。前一個「因為」，說明了四位一體從探究社會生活而起，然而由於作者此前用以探究社會生活的研究取徑是田野工作，因此四位一體在這個時期只用來說明田野工作，對於是否能適用在其他

研究方法有所保留。後一個「因為」，說明了田野工作這項技法特別能夠觸發研究者對於認識論和存在論的思考。何以田野工作特別能夠觸發研究者對於認識論和存在論的思考呢？這是因為田野工作涉及社會生活的三重建構（社會自身的建構、報導人的建構與研究者的建構），社會生活的建構立基於此前對社會的認識，並且將影響後續對社會的認識，因此田野工作更能觸發研究者的認識論思考；另一方面，由於田野工作的重要任務之一在理解行動者的意義世界，而存在的探問背後是對於意義的探問，因此田野工作更能觸發研究者的存在論思考。

經過十七年，在本書中，「四位一體」從田野工作所涉及的四個面向，擴展為所有社會研究都必須面對的共同課題，不論採取什麼樣的研究典範。³

四位一體的論點原本是來自田野工作：田野工作者一旦進入田野，這四個面向即會迎面撲來；然而，其他的研究途徑，如計量與歷史等，同樣也會遭逢到這個面向，只是各個面向的顯隱程度不同、四位的連結方式不同、研究者對這四者的察覺與反省程度不同。（頁 22）

由以上說明，我們可以知道，「四位一體」是從作為研究方法的「田野工作一石四鳥」、「田野工作四位一體」，逐步擴展到「研究者的四位一體」，乃至社會學實作（sociological practice）的「四位一體」。本書中的「四位一體」不只用來指涉田野工作，並且擴展到整體社會研究。此一融會了技法、基本議題、認識論、存在感的社會研究之整體，作者名之為「社會學之道」。

如果四位一體中的「四位」是技法、基本議題、認識論、存在

3 Robert Alford (1998 / 王志弘譯 2011) 在 *The Craft of Inquiry* 區分了多變項、詮釋、歷史過程等三種研究典範。

感，那麼「一體」是什麼呢？謝國雄（2007: 4）在《以身為度、如是我做》中曾說明：「技法、基本議題、認識論與存在論四者，在討論時可以區分，但在實作上則是一體。『一體』的主要意涵是這四者彼此緊密連結，形成一個整體」。本書則重申了前書對於四位一體與研究者的「存在感」之間關係的闡述：「四位一體皆是因為探究社會生活而起，是作為研究者的四位一體。這是學術本分的立場，是一種在上述四位一體背後後設存在感」（頁 403）。

就其擔綱者而言，是研究者具身結合了四位一體；就其狀態而言，是研究實作使「一體」賦形成像。換言之，「一體」一方面是結合了技法、基本議題、認識論與存在論的研究實作，另一方面是承擔了社會研究召喚的研究者。一體，是研究者與社會研究的合一。

2. 田野理路

前文在說明建構社會研究的整體性時曾引述，「以整體當作研究目標與研究成果時，其主要的工作是勾勒出田野理路，並且確立這個田野理路的特徵」。那麼，「田野理路」又是什麼呢？作者在第三章〈他們為何打拼？我們為何研究：論田野理路（一）〉開頭，將其想法表達為下面這段文字：

發展出深刻的謎題之後，接著就要試著找出答案。我們以「田野理路」來稱呼這些答案。這裡的「田野」，指的是研究的對象或者場域，包括了我們通常理解的具體的時空，以及超越具體時空的場域，而「理路」指的是研究的對象或場域中的運作邏輯。

田野理路是社會秩序的具體展現，因此，探究田野理路就是在探究社會秩序這個社會學基本議題。（頁 84）

根據上面這段引文的說明，「田野理路」包含了三種相互關連的意涵：

1. 「田野理路」是社會研究所提出謎題的答案。
2. 「田野理路」是研究對象或研究場域中的運作邏輯。
3. 「田野理路」是社會秩序的具體展現。

社會學所要學的事，是提問的能力、回答的能力與實踐的能力，所要解答的便是研究對象或場域的運作邏輯，由此掌握社會秩序如何構成、如何運作、有何效果。謝國雄將「場域運作邏輯」和「社會秩序」重新概念化為「田野理路」，經由「田野理路」的界定，「田野」的意義被延展開來。「田野」，不再只是一種研究方法，而成為不同類型社會研究的總稱；它不只是研究技法，並且也是研究答案。「田野」的意義擴展為「社會」，「田野理路」成為社會構成樣態、社會運作方式及社會行動邏輯的總稱。

3. 從「存在論」到「存在感」

在「四位一體」這個社會學研究的整體架構中，謝國雄對技法、基本議題、認識論都提煉並增益了其內涵，但最具有創發之功的是「存在感」。

在《以身為度、如是我做》中，謝國雄是以「存在論」來指涉研究者的「生命情調」、研究者的「終極關懷」，乃至研究者的「立場」。在這個原初脈絡中，「存在」並不是一種「感」，而是一種「論」；「論」是研究者的主張，在田野工作四位一體的脈絡中，是研究者對於研究的主張。「存在論」所要說明的，不是研究對象，而是研究者。

到了《港都百工圖》，謝國雄轉而以「存在感」來擬情港都勞工的人生感觸，存在探問所關注的對象，從研究者轉移到研究對象：

報導人的存在感在“Boss” Island 與《純勞動》中並未被正面處理，直到《茶鄉社會誌》才被搬上檯面，如「做」的現象學經驗、研究者的探詢撞擊出茶農的白色恐怖焦慮，以及茶農對家、平權與務實的關懷等。到了《港都百工圖》，研

究者不僅將勞動者的存在感與能動搬上檯面，更將其確立為基本議題。（頁 404）

那麼，什麼是「存在感」？在《港都百工圖》中，謝國雄對「存在感」的說明如下：

「存在感」是有關「是什麼支撐我的一生」、「我的一生是怎麼走過來的，為什麼會這樣」、「我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人生所為何來」等感受、質問與反思。（2013: 40，另見 148）

存在感的內涵，即支撐生存的軸心意義，如家、工作，以及對等交換與公平的倫理要求。（2013: 276）

「存在論」這個詞的直觀意義是研究存在的學問，是對於存在的客體化考察，由此得出關於存在的知識，「存在論」從而相當於「本體論」（ontology）。相較之下，「存在感」的直觀意義是對於存在的主體性感受，強調的是人對於自身工作、生活、生命意義的具身化感觸。如果「本體論」這個概念所要探究的是人事物的根本性質，那麼「存在感」這個概念所要強調的則是人的意義感。

在《四位一體的社會學之道》中，「存在感」⁴結合了《以身為度、如是我做》及《港都百工圖》的關注對象，既被用來理解報導人，也被用來說明研究者。

存在感涉及研究者為何要進行學術研究？研究者的終極關懷是什麼？……

同樣的，報導人也有其存在感：此生在追求什麼？眼前工作

4 在本書書稿中，「存在感」共出現 498 次，相較之下，「存在論」只出現七次，用法與「存在感」並無區別。

（家庭、社區、各種活動）的意義是什麼？（頁 21）

本書的「存在感」（existential touch）指的是終極的價值關懷，重點是「感」（touch），如：研究者為了什麼做研究？報導人為了什麼經營他們的社會生活？（頁 276，註 136）

如是，「存在感」指涉了兩種內涵，其一是支撐報導人生存的意義感，其二是支撐研究者研究的意義感；《港都百工圖》和《四位一體的社會學之道》都包含了這兩個面向，但相較之下，《港都百工圖》更強調港都勞工，而《四位一體的社會學之道》則對研究者的關懷和價值再三致意。其意義連結就如同本書三、四章的標題：「他們為何打拼？我們為何研究？」兩個問題被連結起來，意味著研究者在反思自身研究時，察覺並體會到報導人和研究者的會通處，也就是對意義的探問。

將存在感當成基本議題來處理，是研究者的另一個存在感轉向。首先，他必須先偵測到報導人的存在感，而這之所以可能，是因研究者自身體證到了存在感。（頁 403）

從「存在論」到「存在感」的用詞轉移，反映了當作者要以「四位一體」的架構來整合先前的著作時，面對《以身為度、如是我做》中「存在論」所探詢的研究者價值關懷，以及《港都百工圖》中「存在感」所探問的報導人生命感觸，試圖以同一個詞彙來指涉研究者及報導人，含括社會研究中的主客體，從而確認了以「存在感」作為整合研究主客體兩者意義的用詞。綜言之，「存在感」所要擬情理解的不是社會或文化，而是社會和文化中的人；「存在感」所要返身回望的不是社會研究，而是承擔起社會研究志業的研究者。

結語：以身為度的社會學之道

就闡述社會研究的心法而言，《四位一體的社會學之道》這本書推展了《以身為度、如是我做》對於田野工作的學思與實踐，將「四位一體」從田野工作所涉及的四個面向，擴展為社會研究所包含的四個向度；並將「田野」的意義擴展為「社會」，同時以「田野理路」作為「場域邏輯」和「社會秩序」的代稱，以之界定社會研究的任務及目標。經此演變，「四位一體」中的「一體」，其所要掌握的並非某種被設想為實體的一，而是從無到有，一分為四，由四合而為一的社會研究整體，名之為「社會學之道」。

「社會學之道」的實踐是為了什麼？讓我們回到《以身為度、如是我做》出版的 2007 年，回看謝老師對自己身為研究者的意義陳述。

四位「一體」，反映了我的立場，但四位「一體」的初衷與目的，終究是做出深刻與原創的研究。這是學術本分的立場，是一種在上述四位一體背後的後設存在論。（謝國雄 2007: 4-5）

在研究過程中，田野工作捲入了我的認識論（「社會」是多層次的實在、田野工作者必須培養「丹田」——即深入掌握學者的知識——以及報導人有其主動與創意行動的能力等），同時也觸動了我的存在論（堅信學術本分、立志寫出深刻的著作、力行與報導人平起平坐、關心弱勢、對人生有疑情、深刻體會無常等）。（謝國雄 2007: 90）

那麼，身為一名教育工作者，作者的心停駐何處呢？在 2008 年的「清華社會學」課綱開頭，謝國雄寫了這麼一段話：

當我的鼓動停止時，
如果有一個新的生命在你的胸中停駐，
我就很滿足了。
夏目漱石《心》

十六年後，謝國雄於中研院社會所新書座談會中說了這麼一段話，如同對十六年前的自己所做的呼應：「以實作為核心的研究實踐，寫成書就死了。讓它復活的方法，是活在各位的實作中」。⁵

參考文獻

- 謝國雄主編，2007，《以身為度、如是我做：田野工作的教與學》。台北：群學。
- 謝國雄，2013，《港都百工圖：商品拜物教的實踐與逆轉》。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Alford, Robert R. 1998. *The Craft of Inquiry: Theories, Methods, Evid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王志弘譯，2011，《好研究怎麼做：從理論、方法、證據構思研究問題》。台北：群學。

5 筆者根據當日筆記的整理，文字或有出入，但意義應無改異。